

立志闻道：戴震德育思想探析

●魏冰娥

摘要 戴震德育思想是我国传统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有:志存闻道的德育目的;性善即有知的人性假设,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强调不可躐等的德育过程等。戴震德育思想中对于德育社会目标和责任的追求、对个体德性的追求和培养,都是我国儒家德育思想的传统和精髓。认为自然科学的事理也有利于主体德性的培育,则是戴震德育思想的重要特色。

关键词 戴震 德育 中国传统哲学 传统德育

作者 魏冰娥,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重庆 401331)

18岁便“随父文林公客南丰,课学童于邵武”的戴震,不仅是清代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大教育家。从青年时代起,戴震就在各地讲学,授课的对象由最初的蒙童至当时名门之后(如王念孙之子王引之)等,各个阶层都有。在长期的讲学与教育实践中,戴氏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儒学是成人成己、立世为德之学,以“私淑孟子”自称、立志“正儒名”的戴震,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之必要性 “志存闻道”与“蔽隔天下”

戴震在著作中曾多次表明教育的主要目的与最终目的是立志闻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于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①由此看来,17岁的戴氏将获取《六经》中的圣贤之道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并将其贯穿于此后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与教育活动中。在他看来,人们接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获得孔孟等古经中的天道与人道,也即“闻道”。

具体来说,道的内容又分为自然之道(理)、人物之道(理)与事为之道(理)。“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②闻“自然之道”,也就是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外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用戴氏自己的话说即是“察事物几微之分理”。在他看来,每一客观事物都有自己

的道理与规律,要通过学(也即教育)来获得。同理,闻“人物之道”与“事为之道”就是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关于人自身与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的普遍规律。当然,这三者之间人伦事为之道是最重要的。人伦事为之道,也就是儒家一向提倡的贤人与圣人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讲,主要指人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样看来,培养人的德性,成为戴氏所主张的教育目的——“志存闻道”的最终也即最重要的目标。换句话说,德育实是戴氏教育生涯中最为关注的实践目标。

在他看来,人们若不能将通经之德作为培养目标,则不可能真正辨识所主张的三种“道”或三种“理”。“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③不能真正辨识理的后果,对于为政者来讲,便是不能更好地教化民众,难于治理国家;对于民众来讲,则是不可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经世致用之材。为政者与民众均因为没有获得道,而无法以道来改造自己周围的世界与万物,更无法做到与他人和谐共生。

为此,戴氏还批判了当时的考据学者。认为,考据家所从事的“六书九数”等名物制度的训诂与考订仅是“轿夫”之学,而主于精审与综合的闻道活动,才是“轿中人”之学。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戴震道德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12XZX010;2012年重庆师范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我国高等学校特殊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的成果,批准文号CSJG123102。

“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异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④在他看来，考据家的考据是纯技术的工作，只是闻道的手段，不可能成为为学育人的主体（轿中人）。因此，要做轿中人，探究天地、人物、事为之道，并将其教化于人。

戴震不仅从正面角度论述了德育对于民众与为政者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还从反面视角阐述了不加强道德教化所产生的消极，甚至是严重后果。他认为，如果人们不加强德育之学，则会导致私欲泛滥和内心蒙蔽，进而使自己与事物发展规律本身产生阻隔。以自私和蒙蔽之心来行为，又会产生“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之己”的结果。^⑤私欲泛滥与内心蒙蔽的结果，使人与事物本来的真相相隔。于为政者而言，即是与天下民众的福祉相偏离；于普遍民众而言，即是行为荒诞、遇事穿凿附会。进一步讲，为政者不能考虑到人们现实幸福要求，便会产生“以理杀人”及虚假道德的社会暴政，最终与天下人相隔。“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普遍民众若不能学习并遵行“道”，则不能充分展现其才能，实现社会的最大化；还会形成顽固不化、主观臆断的人格特征。“以己蔽之者隔于善，隔于善，隔于天下矣。”据此，戴氏认为其所生活的时代，即是强权者以程朱理学及理为借口，杀人于无形的时代。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不仅无视这一社会德育忽视所造就的社会后果，而且普通民众的正常人性需求也没能得到合理的满足。长时间的欲求压抑，必定会形成偏执、甚至异化的人格，既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也无益于社会整体道德的提升。

二、德育之可能性 “性善即有知”

与前人不同的是，戴震对孟子的性善论赋予了新的阐发。他认为，人的性善在于人有“心知”，人有“心知”则可以被德加以充实，从而“日进于智”，对天地、人物、事物之理无所不知，娴熟运用，以治理社会与人自身。

他指出，原始儒家的性善论旨在说明，人先天就具有一种认识事物及人伦道德的认识能力，也即“心知”。“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心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凡相忘于习则不觉，见异焉乃觉。鱼相忘于水，其非生于水者不能相忘于水也，则觉不觉亦有殊致矣。闻虫鸟以为候，闻鸡鸣以为辰，彼之感而觉，觉而声应之，又觉之殊致有然矣，无非性使然也。”知觉能力是人和动物才具有的。觉是人与动物接触到外在刺激后，由睡而醒的状态；知是在觉的基础上，心贯通所思的结果；知觉就是人与动物对外在刺激反应所体现的感知活动，心最终会由觉而思而知。人的知

觉能力与鱼鸟等动物相比是最强大的，可以大到知觉礼义。人的这种知觉能力，既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更是孟子所说的人性善。“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

他认为，进一步讲人的知觉能力还可以通过不断扩充（教化），由“精爽”状态至“神明”状态，继而知“仁义礼智”。“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

他指出，人的心知将其天然的认识能力运用于社会生活，确证“恻隐、羞恶、恭敬辞让、是非”之“四心”的存在，继而使人性体验这四种道德情感。“然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四种道德情感，反过来又依靠心知进一步化育扩充，形成“仁义礼智”四德，最终体现人性本善。“于其知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知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知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知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知恻隐之情（心），扩而充之，就充分地具备了仁；知羞恶之情（心），扩而充之，就充分地具备了义；知恭敬辞让之情（心），扩而充之，就充分地具备了礼；知是非之情（心），扩而充之，就充分地具备了智。

在戴氏看来，儒学性善论的关键，在于人先天就具有“心知”这个能够获得仁义礼智四德的认知能力。我们要培养儒家的圣贤人格，只需要不断地对人的这种心知能力进行道德教化与情感熏陶，就必定可以完成。

为论证上述可能性，戴震强调“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非谓尽人生而尧舜也。……《论语》言相近，正见‘人无有不善’；……人虽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非远近之名。”孟子说人人都可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格典范，并不是指人们天生就是尧舜，而在于强调人能通过后天的教化，提高认知能力，达到尧舜那样的圣贤境界。《论语》“性相近”是指每个人的性都是善的（都具有心知）。人与人之间的愚智差别只与“心知”的“远近明昧”有关，而与人性的本质（善或恶）无关。上智之人与下愚之人的“心知”，从质上讲都具有认识道德的能力，就量而言二者却有多（明）和少（暗）的差别。即便如此，下愚仍然具有使“心知”由暗变明的可能性。孔子的“下愚不可移”，实际上是说下愚主观意愿上没有接受道德教育来扩充“心知”而导致其“不可移”，而并不是下愚客观能力上不具备可移的能力。据此，从人性本善上讲，无论贵贱智愚，人人都可通过教化而获得德性，从而成就圣贤人格。

三、德育之方法 “因材施教”与“不可躐等”

道德教育是可能的，我们该如何对人员进行道德教育呢？戴氏在《原善》三篇中指出“言乎其同谓之善，言乎其异谓之

材,因材而善之谓之教。”每个人的材质,也即基本才能不可能完全相同,在进行道德教化时,应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材质制定相应的德育实施计划,这样才可达到“善”的效果。他依据材质之异,强调先知先觉的君子在教化不同材质的人时,应分别以“可以语道”、“可以语善”、“可以语性”来加以区别。“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为,性之事能,合之则中正,违之则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顺者,可以语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与语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与语性。”^⑥在德育实施的过程中,先知先觉者应教授人们满足欲情的合于中节之伦理规范,以及天地万物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常则)。然而,并非人人能够领悟并掌握这些规范及规律。因此,德育的培养只能因材而施。能够领会自然界的顺畅发展规律者,可以与他谈论天道;能够体会天地万物生长常则者,可以与他谈论善;能够体悟天地至善之德者,可以与他谈论性本身。需要说明的是,在“因材善之”的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循循善诱式的引导。“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⑦通过学的方式来使人的心知如打开窗户一般豁然开朗,就好比要依靠每日的饮食来维持机体的健康运转一样,长此以往,愚笨之人的德性与认知能力也就得到扩充与提高。这样的培养方式虽然表面看来是柔弱的,但实则强大无比。

正因为“学”要诱导,因此,对人们进行德育培养,在戴氏看来,是一个“必有渐”、“不可躐等”的缓进过程。在谈到德育之“明道”时,戴震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⑧“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必循其阶,而不可躐等。”^⑨古经精华体现在所阐述的道中,道的获得只能经由先获得经之字义,再获得经之词义,进而获得经之道的渐进过程,才能得以实现。由古经明了古圣贤的心志,就似登上大堂只能一步步沿阶而上,不可随意跨越阶梯而了解。

据此,可以窥见出戴氏治学与教学之实事求是的朴素作风。戴震的由“字词”以“通道”,“不可躐等”之德育培养方法,实是对孔子德育方法的进一步承接与发挥。与孔子说法不同,但却同样表达了“拔苗助长”不可为的孟子德育方法。表现为“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要先填满坑洼才可继续向前流行,同样,君子立志与培育德性也必要先成文章才可通达。戴氏与先儒一样,均主张务实而循序渐进的德育培养方法。此外,主张“学贵精,不贵博”等方法来培养德性,实际上也

与上述方法一脉相承。

受时代限制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戴震德育思想的内容主要指孔孟之书等《六经》中的义理、名物、制度等内容。然而,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戴震,与前儒不同的是还很注重对自然科学的掌握。在他看来,明白自然科学的规律与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同样有助于主体德性的培育与发展,这是作为科学家的戴震不同于前人的重要创发。尽管他的德育并不能全部、直接地为当代的德育培养所采纳,但却构成当代德育思想不可逾越的传统资源。

戴震的德育思想是我国传统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志存闻道的德育目的,性善即有知的人性假设,因材善之的德育方法和强调不可躐等的德育过程,符合现代德育基本共识。其对于以理杀人的清醒认识,是今天反对德育完美主义的重要历史借鉴。德育不能完全用过高的理想标准来要求社会大众,而需要德育的现实性和目标的合理性。戴震德育思想中对于德育的社会目标和责任的追求、对个体德性的追求和培养,是我国儒家德育思想的传统和精髓。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并认为自然科学的事理也有利于主体德性的培育,这是戴震的个人特色,也是我们在未来德育研究中值得探索的领域。

注释:

①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217页。

②《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78页~297页。

③《凤仪书院碑》,《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21页。

④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52页。

⑤《原善·三篇上》,《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57页。

⑥《原善·三卷上》,《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32页。

⑦《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87页。

⑧《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140页。

⑨《古经解诂沈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92页。